

500警力突击出租房不可取

【异论锋生】

据《京华时报》报道,11月21日晚,北京丰台警方对出租大院和出租房展开了突击行动。警方当晚动用包括荷枪实弹的特警在内的500余名警员及协警,封锁东管头地区后进行清查。截至记者发稿时,警方已将该地区800余名可疑人员带回审查,拘捕了16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一名网上通缉逃犯。

显然,“500警力突击出租房”是一种典型的运动式执法。虽然拘捕16名犯罪嫌疑人,是以800余名可疑人被带回审查

点审查作为代价的。警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合法的暴力”侵犯了公民的权利,这并不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是一种罪及无辜的“连坐”。因此,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不仅进一步恶化了警察形象,甚至有可能激发群体性事件。基于此,运动式执法的正面执法效果,恐怕要远远低于其连带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

此外,“500警力突击出租房”还必然建立在这样的执法理念上:公安机关的管理便利要优先于外地公民的公民权利。作为强势的执法部门,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在选择执

法手段时,都应该本着“以人为本”、“尽其最善”的原则,尽量避免伤害及无辜,避免采取“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执法手段。因为,权力作为一种手段,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实现保障公民权利这一目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外地人的权利。

只有在“穷尽一切手段”之后,“合法暴力”的使用才是合理的。权力是在遇到边界的地方才会停止。平时认真细致的工作才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根本,不仅能取得可观的执法效果,而且不至于让800余名外

地人在“荷枪实弹”的恐怖气氛中成为16名犯罪嫌疑人的“陪绑”,这无疑要比粗暴的运动式执法强千万倍。所以说,“500警力突击出租房”,应该而且只能是一个兜底性质的最无奈的手段,而不能是动辄使用的常规手段,更不能是首选手段。

说到底,警察执法是为了让人们感到安全,所以在执法过程中更应该让人们感到安全。“500警力突击出租房”,是以破坏社会治安的方式来“维护社会治安”,当然只能是一个下下策。

(舒圣祥 杭州 职员)



中国式人事斗争阴谋

黄健翔风波,还真有点没完没了的架势。昨天,网上又曝出央视对黄健翔的“内部通报”,哦,原来,黄健翔不是自己辞职的,是被央视劝退的!加之黄健翔自己也声称“正卷入一场‘中国式人事斗争阴谋’”,不禁让人生出几许联想。

自从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热播以来,以“中国式”打头的语句逐渐多了起来,相信“中国式人事斗争阴谋”也是沿用于此。

不管黄健翔是否遭遇了“中国式人事斗争阴谋”,相信很多人对此都不陌生,甚至领教过这种“阴谋”的厉害。而且,这种“阴谋”大多发生在看起来“档次”比较高的单位,主要特征是:当这个单位不想用你的时候,但又不会直接开除你,因为找不到开除的幌子。而是实行类似“家庭冷暴力”一样的方法,不打你,不骂你,但是要晾着你,让你无法正常做事,让你处在风口浪尖,让你自己感到难受,最后不得不自行离开。要么就整出一大堆“欲加之罪”,再施以冠冕堂皇的说辞,对这个人下逐客令

的同时,还要表现出或惺惺相惜、或恨铁不成钢、或仁至义尽的样子。这种“斗争”方式,因为比较“文雅”和隐讳,所以有人笑称为“杀人于无形”中。中招的一般都非泛泛之辈,就是这个单位的“出头鸟”,乃至拔尖冒尖、容易惹麻烦甚至是领导眼中的“异己”。与个别素质不高的小老板看谁不顺眼就撵谁走人的“痛快”方式相比,“中国式人事斗争阴谋”更加可怕。看起来,似乎照顾了当事人的面子,实际上却是伪善之举。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现代人事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式人事斗争”的市场,已经越来越小了。况且,真正有能力的人,是不屑于、不惧怕这种所谓的“人事斗争阴谋”的。比如黄健翔,已经传出好几家电视台竞相抢夺他的消息。而制造和实施这种“人事斗争阴谋”的人或单位,未必能获得益处,相反却容易损及自身。

谁说“性服务人员”合法了

【公民发言】

《西部商报》11月22日报道,兰州市日前正式启动“100%安全套使用项目”试点。100%安全套使用项目要求必须做到(人、时、地)三个100%,即:100%的娱乐场所推广安全套;100%的性服务人员在商业性关系中使用。

“性工作时间”、“性服务人员”、“商业性关系”,不用说,这都是些“敏感词汇”。对于我们这个极重“正名”的文化传统来说,这些不带感情色彩甚至略有某些郑重其事的称呼肯定出乎相当多人的预料,就像某些网友所言:这样一来,不是从禁止到默许了吗?

有此一问,更要赞赏兰州市的勇气。

社会治理需要面对现实,而不是忙于占领道德制高点。不管原因如何,“卖淫嫖娼”屡禁不绝是个铁的事实,并且成为性病尤其是艾滋病高发的重要源头。卫生部昨天的通报显示,全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已达183733例,其中经性途径传播的明显上升,哨点监测资料显示,暗娼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1996年为0.02%,2005年有9个哨点暗娼的感染率超过1.0%。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最大的道德是治病救人,阻止艾滋病扩散,需要“救”的人,当然包括那些“性工作”——而不是为了一己的道德清高感,对危险视而不见,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对于政府来说,做这样的“鸵鸟”就是失职;对于社会来说,则有听任肌体腐烂的自杀之嫌。

关于“性工作”的管理问题,近几年曾经几次引起大的议论。政府和民众的困惑仍旧集中在对这个人群的道德定位上,一旦对其加强管理,则难逃“转正”之嫌。

现在,是到了抛开这些无谓争论的时候了。道德评价不应阻止政府和社会功能的正常行使,防治性病也绝不是肯定卖淫嫖娼的合法性。“非此即彼”的旧式思维于事无补。

(孙正群 山东 记者)

城管“以罚代管”行不通了

【新华时评】

近日,兰州市“千名城市协管员”执法尝试流产,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城市管理问题的热议。从媒体报道来看,兰州市“千名城市协管员”执法尝试流产,表面原因是“协管员”执法资格缺失和经费困难,而实际上,它暴露的是我国城管工作长期存在的落后观念和方式。

城管人员和小商贩“捉迷藏”现象,在如今的许多城市都已成为一大景观,任凭城管如何加大“围剿”力度,善打游击的小商贩们总能找到生存的空隙,由此引发的小商贩、城管队员被打伤事件此起彼伏。

这个群体本身的生活需要,也体现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为了“文明城市”而无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要,以维护市容秩序为目标,用清除代替管理,势必把小商贩们推向城市的对立面,人为制造社会矛盾。这实际上是对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误解,是对文明的不自觉背叛。

人们注意到,已经有一些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乌鲁木齐市把小商贩当作“宝”,积极开办夜市,使全市70多个夜市不仅成了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亮点”,还提供了数万个就业岗位。从短期看,这样做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但长远上是有利于城市繁荣、社会稳定和市政管理的。

新华社记者 王研

最短命任期并不是偶然

据《新闻晚报》11月22日报道,从2006年7月28日就职,到2006年9月20日被免,54岁的保定前市委书记王昆山在任上仅仅停留了54天。多方消息证实,王昆山已被河北省纪委“双规”。据河北省委一位高级官员透露,王昆山的“落马”原因为“索贿买官”,“他算是任期最短的市委书记了”。

王昆山的“短命任期”确实罕见,但并非绝无仅有。与他不相上下的有湖南省临武县原副县长陈纪忠,上任57天就落马,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真正登峰造极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原副县长马发旺,2004年5月17日,泾源县交通局原局长马发旺被组织部门任命为副县长,后经群众举报,6月7日,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将其刑事拘留,其仅在副县长官位上呆了20多天。

这些“上马就落马”的官员,无不对应了一个词:带病提拔。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提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考核。

每当官员“落马”,我们总会看到一些人出来说“过去的事情”,这已经是“规律”。王昆山“落马”的新闻中,早年王昆山曾经担任过厂长的沧州造纸厂的一名员工说,“老员工说他不是一个负责的厂长,他们对他的评价都不怎么样。”王昆山这么些年一路青云,这个时候才翻出“评价都不怎么样”的说法,是不是太晚了呢?我不知道“老员工”占多大的比例,所说是否可靠,我只想问:有关方面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了这些意见?该在“上马”前就翻出来的“过去的事情”,是否还有没被翻出来的?又该由谁去翻出来呢?

王的“最短命任期”拷问着我们的日常人事考核。平时的考核做不好,提拔前的考核是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防止“带病提拔”,需要从平时就开始严查“带病者”,而不能只靠提拔前的突击考核。否则,东出一个“短命书记”,西出一个“短命县长”,就很必然了。

(李辉 广西 职员)



艺校学生陪酒实习 教育产业化结出的恶果

【漫话天下】

据11月22日《现代快报》报道,桂林一舞蹈学校借“实习”的幌子,将22名未成年女生送进娱乐场所当陪酒女。

这是教育产业化种下的一枚恶果。在我们以往的认识里,教育产业化往往跟择校、乱收费、扩招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很少有人想过它还意味着生源出租、人体推销和色情服务。桂林这所舞蹈学校向我们演绎了教育产业化的另类模式:在名校扶优质教育资源公开合法地择校、乱收费、扩招的同时,得不到国

家一分钱的民办学校也在设法从生源出租、人体推销和色情服务中分享教育产业化的成果,实现着边缘化生存。

“笑贫不笑娼”已然成为我们这个商品社会默认的严酷现实,可怕的是,这个带血的现实如今正在影响着教育的理念和操守。对于桂林这所民办学校来说,什么是道德呢?他们建立了一套另类的、畸形的道德法则:生存才是最大的道德,没钱才是最大的无道。正如校长郭桂生所宣称的,自己组织实习“是为了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是在做好

事”。陪酒事件彻底暴露了教育产业化的丑陋。事实上违规办学已成为一些民办学校的潜规则,对此清理甚至是取缔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自负盈亏的民办学校,首先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中国教育的体制问题。国家允许社会力量办学是正确的,但是教育产业化的方向不改,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无疑都将走向歧途,只不过民办学校将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而已。

(司欣 江苏 职员)

撒谎官员迟早要付出代价

【今日视点】

昨日,各大媒体均报道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今年第3批挂牌督办的6起环境案件,与以往两部门挂牌的企业肆意违法排污、地方政府出台土政策的案件不同,今天被挂牌的还有一起“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当众撒谎欺瞒督查组”的案件。

事情是这样的,9月22日,在六盘水市,当国务院派往贵州督查组向当地政府询问该市环境质量时,六盘水市副市长叶大川表示,“六盘水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常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城市空气质量为贵州省9地市最好”;“在六盘水境内没有任何煤化工企业”;“水源保护区也没有任何工业企业”。

而事实上,督查组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这些说法并不属实。督查组发现六盘水野马寨发电厂未履行相关程序擅自开工建设投产;不少矿区存在水污染隐患,有些甚至已经污染了当地的饮用水源。在这次两部门的通报材料中提到,六盘水境内并非如副市长所说没有任何煤化工项目,而是有30家以上的焦化厂。

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把“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当众撒谎欺瞒督查组”作为独立的案件跟其环境案件并列,是与以往公布环境案件的最大不同。可以说,它开启了问责撒谎官员的先河。这种做法比单纯的问责六盘水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官员因撒谎被问责,身份最高的恐怕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克林顿被弹劾,并非因为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本身,而是其在这件事上的撒谎行为,为此还差点丢掉总统宝座。可见,一个官员是否诚实是民众心里的重要。其实,我们也有问责官员撒谎的法律规定,比如《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然而,实际中,官员撒谎被问责并不常见。

六盘水副市长的撒谎,反映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地方官员为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污染,甚至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环境治理的乏力,不在于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是在于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地方官员的决心。可事实上,环境法律法规执行不力,一些官员对于环境

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情况下,问责撒谎官员,有利于破除环境治理上的地方保护主义。

延伸开来,问责撒谎官员,也具有普遍意义。当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大有人在。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局长还要求统计人员“不出假数”是对国家是否忠诚的简单判断。这说明,数字作假很普遍。而数字作假就是官员撒谎。因此,问责六盘水副市长的撒谎,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那些喜欢在数字上作假的官员的一次警告。只不过,要真正把问责官员撒谎的影响扩大,还要在其他领域内采取同样的措施。

官员首先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为官的基本前提。此前,有一些地方把孝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我们认为,相对于孝,把是否诚实列为考核内容,则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做一个诚实的人,为官才不会欺上瞒下,才会正视问题和现实,并加以解决;也只有官员把诚实作为一个共识,更高的决策部门才能根据事实作出合理决策,而不至于决策失误。不独环保,在所有领域存在欺瞒言行的官员,都应该问责。

(王攀 河南 职员)